

扩大进口背景下中国进口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制造业就业的视角

张文钺¹, 李光武², 陈明明³

(1.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北京 100033; 2. 中国人民大学 经济学院, 北京 100872;

3. 青岛大学 商学院, 山东 青岛 266061)

摘要: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中国在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的同时也成为世界第二大进口国。以往对中国贸易的研究多是从供给端出发, 然而从需求端来看, 中国进口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又有几何? 本文在扩大进口战略背景下从全球制造业就业的视角对中国进口与世界经济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 研究发现, 通过对中国出口, 相关国家的制造业就业实现正增长, 但是两者关系会在不同贸易商品、经济发展程度和时间样本之间存在差异。在此基础上, 本文进一步从就业创造和就业破坏等方面展开了机制分析。本文的研究表明, 中国通过“世界市场”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全球失业率, 但同时也需警惕“进口竞争”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关键词: 扩大进口; 世界市场; 制造业就业; 就业创造

中图分类号: F74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980X(2023)3—0154—13

一、引言

国际贸易作为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世界各国参与全球经济建设的重要一环,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取得了长足发展, 与其相关的研究也涉及越来越多的领域。国家间在进行贸易往来的过程中, 生产要素的跨国跨产业流动会对当地要素市场带来至关重要的影响, 而与经济发展程度与比较优势不同的国家进行贸易所产生的冲击也不尽相同。同时, 随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地位的确立, 中国经济的腾飞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影响也囊括了经济增长的方方面面, “中国冲击”已经成为国际政界、学界研判宏观经济所必须要权衡的重要因素。当前学术界对中国问题研究的重点大多是基于中国“世界工厂”的定位, 从供给视角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然而, 从“中国市场”的需求角度来看, 中国在贸易自由化过程中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几何? 依托国内消费力量形成的进口需求是否促进了其他国家的制造业就业? 中国市场的庞大需求是否构成了全球经济健康成长的稳定剂和压舱石? 要对“中国冲击”进行全面评估, 就不能局限于单一的供给视角, 还要从需求视角探求中国市场快速发展带来的影响。

中国政府于2018年7月提出要全面构建新型开放体制, 高质量发展出口和进口贸易, 在更高的水平上促进进口贸易的发展, 以此推动国内供应链质量的提升,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和消费需求, 实现外贸平衡。全面扩大进口并不能仅考虑量上的扩张, 更要注重质的提升, 宏观方面有中国进口来源的布局, 微观方面有进口产品质量和结构, 还有从顶层设计到具体的关税政策和贸易壁垒的逐步取消等等。在现代国际贸易体系下, 扩大进口不仅是获得高质量、多样化产品的重要方式, 也是提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布局的重要路径(许明和卿陶, 2022)。李春顶等(2021)研究发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随着全球经济的高度一体化、资本跨国流动提速和贸易自由化的快速发展,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贸往来日益频繁, 经济联系也越来越紧密, 但是由于比较优势 and 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等因素, 在各方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也随之引发了一些问题, 如产业链的国际转移和重构、劳动力市场失衡等。冯宗宪和李诚(2022)指出中国正从规模扩张驱动的“被动型”进口增长模式转向需求结构、竞争力、供需交互等多因素决定的“主动型”模式, 但与此同时也暴露出一系列内在和外在的问题。随着发达国家失业率的攀升, 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逐渐抬头, 一系列关税

收稿日期: 2023-01-2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一轮科技革命中技术创新的市场选择机制研究”(19CJL036)

作者简介: 张文钺,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博士后, 研究方向: 经济增长, 国际贸易, 不良资产处置; 李光武,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政企关系, 企业金融化, 经济增长; 陈明明, 经济学博士, 青岛大学副教授, 研究方向: 创新经济学。

措施和非关税壁垒被拿来当成阻止国内失业率上升的工具,学术界也已开始关注贸易与就业之间的关系,探讨在影响技术与贸易就业的两大主要因素中,是什么因素对就业产生更大的影响,贸易如何影响就业水平和结构,贸易对工资的影响又是如何等。

在双边贸易交往中,中国-美国、中国-墨西哥、中国-丹麦和中国-西班牙的研究相对较多,而多数研究都表明由于从中国大量进口,导致了这些国家失业率的持续攀升,其中一部分学者甚至将这些国家社会环境的恶化也归因于来自中国的进口竞争(Autor et al, 2013、2017; Acemoglu et al, 2016; Utar, 2014; Donoso et al, 2015; Mendez, 2015)。Mcmanus等(2016)指出近十几年以来,美国国内制造业工人的伤病率逐年提升,造成这一现象的直接原因是在此时间段内,中国对美国出口的急剧扩张所导致,Pierce等(2016)进一步分析得出,美国本土地区进口中国商品越多,该地区统计的死亡率就越高。最近的研究如Asquith和Goswami(2019)在Autor等(2013)和Pierce和Schott(2016)的基础上进一步分解了就业创造和就业破坏,并在行业层面和美国本土就业净变化方面对中国贸易冲击的影响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中国是通过使得美国本土企业退市来影响就业的,而且在通勤区层面,就业机会会从中国竞争比较激烈的行业向其他行业进行转移。

中国贸易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涉及各个方面,既包括对宏观经济指标的直接影响,比如短期物价水平、失业率和GDP,也包括长期的自然失业率、潜在经济增长率,也还有福利经济学方面的诸如消费者福利方面的指标,然而目前的文献多是集中于单个方面进行分析,却忽视了产业相关、经济周期等因素的作用(Amiti et al, 2017)。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和推动者,中国用高速稳定的增长为世界经济的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中国2020”课题组等, 2013),世界各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皆大有所获。与主流的Autor等(2013, 2017)和Acemoglu等(2016)的研究结论不同,Dimaranan等(2007)的研究表明,中国在过去的十几年中通过以“世界工厂”为代价每年向世界加工输送大量高质量产品,不仅美国,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都受到了来自中国进口的正向效应。Feenstra等(2019)指出,贸易对劳动力市场有两种影响:一方面,面临进口竞争的公司可能会缩小规模甚至退出,从而导致工人失业;另一方面,进入国外市场的企业应该进入或扩张,从而创造新的就业机会。Caliendo等(2019)的分析结果表明来自中国的进口使得美国福利增长约0.2%,不仅如此,得益于中国出口商品的低价格,全世界所有国家都从中国的进口冲击中获利。

然而,要全面评估中国贸易的影响就不能仅仅局限于中国作为出口大国的供给冲击,还必须认识到来自中国市场的需求冲击。中国对外贸易包括出口和进口两个方面,中国不仅是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与此同时,近些年的进口贸易总量也稳居世界第二。中国进口对世界的正向影响符合基本的经济学逻辑,一国通过对中国出口,本土企业可以首先享受到扩张的好处,增加投资,扩大生产规模,提升工人工资。然后该效应可以通过产业链依次传导到上下游的行业企业,带动整个经济。刘京军等(2020)从企业投资的角度对中国进口的世界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中国依托庞大消费市场形成的进口需求能够很大程度上促进贸易对象国企业的投资规模,除此以外还能降低相关国家在国际贸易过程中面对的不确定性。Qian等(2020)通过发展中国家的数据研究发现,中国进口能够显著促进样本国家的就业,并进一步改善劳动力市场结构。

以往对中国冲击尤其是中国进口影响的研究往往多是从宏观层面出发,对整体市场进行的分析。因此无论是在微观基础方面还是深入的机制分析方面都存在进一步研究的空间,本文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继续探究,以期得出对中国进口更加中性、客观的评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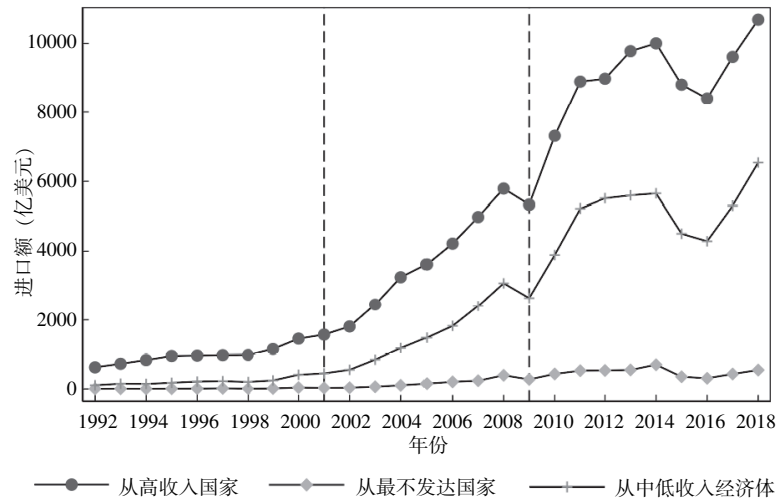
二、中国进口的特征事实

伴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在进口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进口结构也在逐步改善,进口商品涉及的行业越来越广,从微观的资源性产品、初级产品、中等技术产品和高技术产品,到中观的服务业、消费品行业、高端制造业(如半导体和机床)。作为拥有全球最全制造业产业链和最大市场规模的经济体,中国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了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和良好预期。通过与中国合作开展贸易,世界各国的短期收益体现为外贸企业扩张、外汇创收和GDP增长,对中长期的宏观经济而言,外贸企业的扩张会进一步带动本国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长期发展。企业扩张带来的规模效应使得企业的用工需求增长,从而就业市场将随之持续扩大,失业率下降,进而提升消费者生活水平和福利水平。

本文将依次从国别结构和产品结构两个方面多个角度剖析中国进口的特征事实。根据世界银行对收入

水平的分类标准,本文将中国贸易对象国分为高收入国家[包括 OECD(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和非 OECD 中的高收入国家]、中低收入经济体和最不发达国家,并将进口额在这个层次上加总,最终得到图 1。可以明显看出,2001 年以前进口额普遍增长缓慢,入世以后开始明显上升。具体来看,中国从高收入国家进口金额最高,中等收入经济体次之,从不发达国家进口数额最小,并且从高收入国家的进口额与其他经济体之间的差距是随着时间增长的,也就是说,从高收入国家的进口越来越构成中国总进口的主要部分。对于中低收入经济体来说,中国的进口额在 2001 年以后迅速扩张,2018 年增长为 544.5 亿美元,比 2002 年的 29.4 亿美元增长了 515.1 亿美元,年均增长额约 30 亿美元。

从贸易对象国的角度来看,对中国出口占本国出口总额的比重走势有较为明显的变化。表 1 显示,2000 年以前,对中国出口占各经济体总出口的比重总体不超过 3%,并且该占比排名最高的一直是高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占比最低,最不发达国家次之。从 2000 年开始,中低收入国家对中国的出口占总出口的份额一路上扬,2000 年中低收入国家的占比为 6.28%,到 2014 年增长到历史最高的 30.85%,增幅超过 24 个百分点,这说明中低收入国家越来越依赖于对中国的出口贸易。高收入国家对中国出口占其总出口的份额也有较为明显的增幅,从 1992 年的 1.62% 上升至 2018 年的 11.18%,增长约 7 倍。



数据来源:根据 UNcomtrade 数据并经过一系列计算得到

图 1 按照收入水平划分的国别结构进口趋势

表 1 各经济体对中国出口占其总出口额的比重

年份	高收入国家	中低收入经济体	最不发达国家	年份	高收入国家	中低收入经济体	最不发达国家	年份	高收入国家	中低收入经济体	最不发达国家
1992	1.62	0.72	1.12	2001	2.75	6.37	2.15	2010	7.39	26.08	5.30
1993	2.46	0.35	1.29	2002	3.20	4.12	2.49	2011	7.51	24.19	5.50
1994	2.17	0.46	1.28	2003	3.85	8.45	3.03	2012	7.66	27.51	5.41
1995	2.21	1.20	1.36	2004	4.26	12.31	3.09	2013	7.90	26.77	5.54
1996	2.20	0.61	1.89	2005	4.52	16.40	3.34	2014	8.09	30.86	5.12
1997	2.24	0.87	1.72	2006	4.80	17.04	3.30	2015	8.20	18.93	4.79
1998	2.15	0.52	1.54	2007	5.02	24.44	4.12	2016	8.31	25.11	5.13
1999	2.16	0.39	1.55	2008	5.12	20.19	3.67	2017	11.25	27.19	6.10
2000	2.46	6.28	1.94	2009	6.33	25.84	4.98	2018	11.19	27.31	6.81

注:根据 UNcomtrade 数据并经过一系列计算得到。

表 2 展示了 2001 年和 2018 年中国进口排名前 20 的国家和地区的对比,通过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入世以来中国进口的国别变化。可以明显看出,2001 年和 2018 年,中国进口排名前五的国家都是日本、美国、韩国、德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不同的是名次略有变动,韩国从 2001 年的 233.7 亿美元增加到 2018 年的 2045.66 亿美元,成为中国进口排名第一的国家。巴西从 2001 年排名第 20 位上升至 2018 年的第 7 位,进口额 23.4 亿美元增加至 771.41 亿美元。对比 2001 年和 2018 年,排名前 20 的国家中,在两年中都出现的国有 15 个,有 5 个国家消失在前 20 名(中国香港、意大利、英国、伊朗、芬兰),也有 5 个国家进口增加,进入前 20 榜单(越南、瑞士、南非、智利、安哥拉),这说明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入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中国市场对外的需求规模越来越大,同时需求结构也是在不断在变化的。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进口的来源主要是亚洲国家居多,入世后虽然进口格局有一些调整,但没有根本性的变化,这种进口来源过度集中的现象可能使得我国面临重要产品断供、国内外产品价格协同波动过大的风险(赵新泉等,2020)。

从贸易产品结构方面来看,本文根据联合国统计司的统计标准按照贸易商品最终用途将中国进口产品

分为资本品、中间品和消费品进行统计分析^①。如图2所示,中国进口的产品结构是以中间品为主,资本品次之,消费品进口规模最小。自2001年以来随着总进口规模的提升,三类产品的进口也同步扩大,但是中间品进口规模增长最快,其与资本品和消费品的差距快速拉开,以资本品为例,2001年中间品与资本品进口规模的差距位1228.28亿美元,到2018年该差距扩大至12988.66亿美元,扩大超过10倍。消费品总体来看进口增长缓慢,1992—2018年增幅为1428.2亿美元,小于中间品的14651.2亿美元和资本品的2032.9亿美元。

将UNcomtrade中SITC3位码的贸易数据根据Lall(2000)的分类将中国进口贸易数据分为低技术产品、初级产品、资源型产品、中等技术产品和高技术产品来观察中国进口的技术结构。图3的趋势表明,中国的进口商品以中等技术产品为主,初级产品和资源型产品次之,对高技术产品的进口最少,中国进口整体特点是以中低技术和资源型为主导的。对于中等技术产品而言,1992年进口额仅为164.32亿美元,到2018年进口额超过2500亿美元,增长最为迅速,而高技术产品进口的增长则相对缓慢。

表2 2001年与2018年中国进口国(地区)前20对比

排名	2001年		2018年		排名	2001年		2018年	
	国家和地区	进口额(亿美元)	国家和地区	进口额(亿美元)		国家和地区	进口额(亿美元)	国家和地区	进口额(亿美元)
1	★日本	427.873081	★韩国	2045.66451	11	★泰国	47.1384816	★沙特阿拉伯	458.986731
2	★亚洲其他国家	273.387581	★日本	1804.01786	12	★法国	41.0623641	★泰国	449.186702
3	★美国	262.173752	★亚洲其他国家	1773.4696	13	★加拿大	40.2779893	瑞士	387.061989
4	★韩国	233.769454	★美国	1560.04352	14	★印度尼西亚	38.878871	★印度尼西亚	341.546852
5	★德国	137.7219	★德国	1062.57241	15	意大利	37.8427836	★新加坡	336.383157
6	中国香港	94.2249755	★澳大利亚	1050.83431	16	英国	35.2693858	★法国	323.296428
7	★俄罗斯	79.5879451	★巴西	771.41726	17	★沙特阿拉伯	27.158953	★加拿大	283.541105
8	★马来西亚	62.0397595	越南	640.873598	18	伊朗	24.2397066	南非	272.397844
9	★澳大利亚	54.2592547	★马来西亚	633.219539	19	芬兰	23.7626427	智利	269.998138
10	★新加坡	51.2828129	★俄罗斯	588.865492	20	★巴西	23.47232	安哥拉	256.520165

注：★标注的国家为在2001年和2018年中国从其进口规模均排名前20的国家；数据来源：根据国研网数据并经过一系列计算得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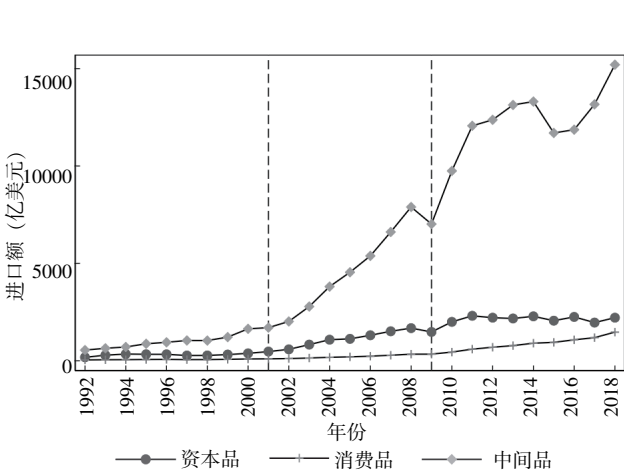


图2 从最终用途分类的中国进口产品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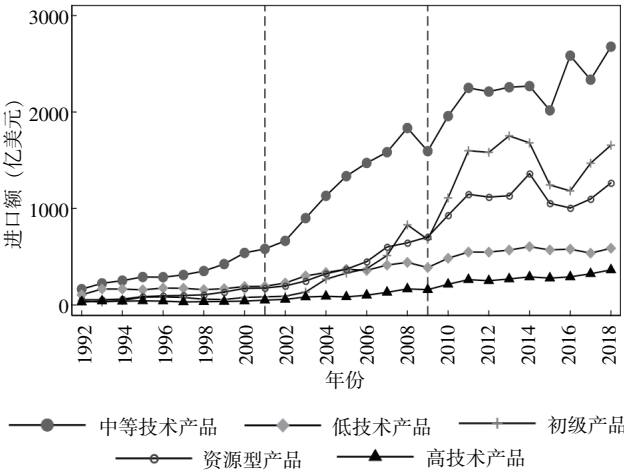


图3 按照技术分类的中国进口产品结构

三、数据与研究设计

(一)数据

企业层面的实证分析主要用到三套数据。首先是企业层面的经营数据,本文采用美国标准普尔公司的全球上市公司数据,时间跨度为1996—2017年^②。该套数据因为其统计精确、覆盖广泛、指标全面等原因成

① 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统计司,以《标准国际贸易分类》订正以及《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2002年)第三版。
② 该数据库包括Compust Global和Compust North America两部分,其统计标准都是统一的,本文将两部分的所有上市公司通过年份和指标进行纵向合并后统一纳入回归数据中。

为国际学术界使用最为广泛的上市企业数据库,其中不仅有上市公司还有已退市的公司,并且其采用的财务数据遵循全球通用的会计准则和工业分类标准。全球上市企业作为本部分核心研究对象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势:①上市公司数据披露时效性强,能够满足本文研究问题所需的样本时间跨度,覆盖范围更具有代表性,而且上市企业会计规则更加规范,数据易得且更为真实可靠;②由于作为市场微观主体的企业能够迅速对市场冲击作出反应,所以基于上市公司员工数与工资数据来研究就业问题比较科学,然后基于行业、产品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异质性分析可以对就业问题进行深度挖掘。参考刘京军等(2020),本文将该数据按照如下方法进行处理:①剔除缺乏企业总资产、现金流、负债率等重要财务数据的样本;②剔除上市公司财务数据中资本总额小于流动资产总额,利润率大于1等与会计准则(GAAP)不符合的样本;③剔除总部不在本国的企业,包括发行ADS(american depositary shares)上市、交叉上市、异地上市等类型的企业;④国际行业分类代码SIC2000-3999之间的为制造业行业,本文将据此剔除该范围以外的样本。最终根据以上四条标准处理后剩余78个国家的57482家上市公司。第二套数据是来自世界银行WITS(world integrated trade solution)数据库中源自联合国UNcomtrade的全球贸易数据和WTO(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的关税数据,其中贸易数据为全球各国对中国的出口数据和中国进口自全球各国的镜像数据,关税数据为中国历年对各国的加权平均关税,并根据Autor等(2013)的方法将上述HS6位码数据根据世行的对照表合并最终统一得到SIC4位码的贸易和关税数据。第三套为来自世行(World Bank)WDI(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数据库和IMF(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的WEO(World Economic Outlook)数据库的控制变量数据如GDP和汇率等。本章所用数据均已删除重复值,并且为消除异常值对实证结果的影响,所有变量均在1%的水平上进行了缩尾处理。

(二)指标构造

1. 总体就业水平

总体就业水平的分析是文章后续深入探究的基础。沿袭王永钦和董雯(2020)的方法,本文分别采用上市公司年末员工人数的对数 $\ln emp_{jic,t}$ 和平均工资的对数 $\ln wage_{jic,t}$ 来衡量总体就业水平,后者是由财务报表中支付给员工薪酬总额与总员工人数的比值所得^③。

2. 就业创造与就业破坏

Davis等(1996)在《Job Creation and Destruction》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就业创造和破坏的概念,并用将相关指标细化到了企业层面(Davis et al, 1996),Groizard等(2015)引用该指标对贸易成本与就业变动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国内学者毛其淋和许家云(2016)借鉴该方法并结合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研究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就业的影响。基于此,本文将企业层面的就业创造定义为

$$jobCreation_{jt} = \max(\Delta emp_{jt}, 0)$$

其中: emp_{jt} 为企业 j 在 t 年份的雇佣员工人数的自然对数值; $\Delta emp_{jt} = emp_{jt} - emp_{jt-1}$ 是企业 j 的就业变化率。就业创造与就业破坏的意义在于反应就业变动的机制与方向。进一步地,就业破坏($jobDestruction_{jt}$)定义为

$$jobDestruction_{jt} = \max(-\Delta emp_{jt}, 0)$$

3. 中国进口的衡量

本文主要用世界各国对中国的出口额来衡量中国进口,度量方法分别为出口额的自然对数值 $\ln exp_{jic,t-1}$ 和出口强度 $exp_{jic,t-1}$ (刘京军等,2020),由 c 国 i 行业在 t 年对中国的出口额与 c 国当年 i 行业的出口总额之比计算得出。

4. 控制变量和描述性统计

考虑到回归所用数据的维度,解释量中分别加入了国家层面、行业层面和微观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详细的指标定义和描述性统计见表3。

③ 根据张川川(2015),除非存在完全的劳动供给弹性,否则出口导致的劳动力引致需求冲击并不会完全体现在就业水平上,在劳动供给缺乏价格弹性的情况下,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会导致均衡工资水平的上升。目前多数文献都集中在总体就业效应的研究上,没有关注出口对雇佣员工平均薪资的影响,因此本文会将研究方向拓宽到工资水平的分析上。

表3 描述性统计

指标代码	指标定义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样本数
lnemp	总体就业:上市公司年末员工人数的对数	4.126	3.538	0	11.221	79052
lnwage	平均工资:支付给员工薪酬总额与总员工人数的比值	6.779	11.183	0	28.654	79052
lnexp	中国进口:世界各国对中国出口额的自然对数	13.212	3.180	2.413	20.485	79052
exportratio	进口强度:由一国某行业在某年对中国的出口额与该年该行业的出口总额之比	0.042	0.077	0	1	79052
lat	公司规模:上市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18.721	3.401	13.582	26.221	79052
lint	无形资产:上市公司无形资产的自然对数值	13.002	8.093	0	24.787	79052
lev	资产负债率:总负债与总资产的比值	0.563	0.597	0.035	3.945	79052
gdp	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各地区GDP增长率	0.027	0.026	0.014	0.051	79052
jobCreation	就业创造: $jobCreation_{jt} = \max(\Delta emp_{jt}, 0)$	0.208	0.808	0	6.094	79052
jobDestruction	就业破坏: $jobDestruction_{jt} = \max(-\Delta emp_{jt}, 0)$	0.011	0.514	0	4	79052

注:回归中所有变量均为滞后一期值,用以消减模型的内生性问题。

(三)模型设定

为检验中国进口对全球制造业就业的影响,本文的实证方程设定如下:

$$Y_{jict} = \beta_0 + \beta_1 X_{jic,t-1} + \beta_2 Controls_{jic,t-1} + \lambda_j + \lambda_t + \varepsilon_{jict} \tag{1}$$

其中: Y_{jict} 为国家*c*行业*i*企业*j*在*t*年的就业水平,本文分别用总体就业lnemp_{jict}和平均工资的对数lnwage_{jict}来表示; $X_{jic,t-1}$ 为模型核心解释变量,分别用出口额的自然对数值lnexp_{jic,t-1}和行业层面的出口强度exportratio_{ic,t-1}来衡量,为了减轻变量内生性,做滞后一期处理; λ_j 和 λ_t 分别为企业和时间固定效应; ε_{jict} 为模型残差项。

控制变量Controls_{jic,t-1}参考Julio和Yook(2012)及Gulen和Ion(2016)主要纳入了企业 and 国家层面的特征因素,见表3中分别有企业层面的企业规模lat、无形资产lint、资产负债率lev。国家层面的控制变量主要考察经济发展程度的异质性,本文以国家(地区)GDP增长率为代理变量。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本回归结果

表4报告了企业层面的基准回归结果。四列都为固定效应回归,表4中(1)列、(3)列考察了对中国出口总量的就业效应和工资效应,(2)列、(4)列考察了中国出口强度的就业、工资效应。根据(1)列、(3)列的结果可以看出,中国出口总量显著促进了制造业企业的就业水平和平均员工工资,(2)列、(4)列的结果表明中国的出口强度同样显著促进了就业水平和平均工资的提高。这初步表明中国进口不仅显著提升了全球制造业企业的总体就业水平,也促进了员工平均工资的增长,这种正向的推动作用在进口总量和进口强度两个方面都有所体现。

(二)稳健性检验

在基本回归结果中,本文发现中国进口显著促进了贸易对象国家的就业和工资增长,这一结论具有高度显著性。但是由于数据和方法的限制,即使已经对解释变量均采取滞后一期处理,本文的研究可能仍然潜在一定程度的内生性问题:首先是遗漏变量问题,即文章所用实证模型可能忽略了一些同时影响上市公司就业变动和中国进口的因素;其次是双向因果问题,对中国出口既能影响企业的就业,反过来企业的对外贸易也会受到公司员工人数的影响,而工人工资又是影响就业水平的重要因素(马双等,2012;董艳梅和朱英明,2016;张鹏等,2019)。所以本文尝试通过多种方法来缓解内生性问题。

1. 控制高阶固定效应

在表4的基准结果中,为了控制年份和企业的特征因素在回归中加入了年份固定效应和企业固定效应。因此,时间趋势和企业层面不随着时间变化的因素将不会给所估计的结果造成影响。但是,一种潜在的担忧是,一些宏观因素对不同国家和行业的影响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从而使得估计结果产生偏误,干扰研

表4 基本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就业水平		平均工资	
中国进口	0.007** (0.045)		0.005* (0.014)	
进口强度		1.112*** (0.263)		0.629** (0.08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4.149*** (0.126)	-2.858*** (0.473)	1.403 (1.256)	1.529 (1.190)
观测值	78940	78940	78940	78940
R ²	0.754	0.759	0.857	0.857

注:括号内为在企业层面聚类的标准误差;***、**和*分别代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

究结论。基于此,本文通过在基准模型中加入国家×年份固定效应、行业×年份固定效应来缓解内生性问题。

表5汇报了控制不同类型高阶固定效应后的回归结果,所有回归均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标准误都是在企业层面进行的聚类。从总体就业水平的结果来看,在同时控制了国家×年份固定效应、行业×年份固定效应的(1)列、(2)列均显示对中国出口在总量和强度上都显著促进了上市公司的总体就业水平。从平均工资的回归结果来看,在控制了不同高阶固定效应后,中国进口在总量层面都对平均工资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虽然中国进口强度的影响系数不显著,但依然为正。综合已有结果可以进一步说明,中国进口对全球制造业就业整体的促进效应是显著存在的。

2. 系统广义矩估计

为进一步消减内生性对基准回归的干扰,下面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重新对中国进口与全球上市公司就业问题的关系进行回归检验。其原理是能够通过将变量滞后阶作为差分方程的工具变量,并且使用差分变量的滞后项作为水平方程的工作变量,达到保证结果一致性的目的。该方法为了消除内生性对估计结果造成的影响,采用了一阶差分来作为第一步估计。然后为了获得一致的无偏估计,会在回归方程中加入因变量和解释变量的滞后项,而滞后阶数将经过实验和推导最终确定得出。通常来讲,gaussian mixture model(GMM)估计可以根据所分析的问题进行一步或两步估计,具体方法是,在第一步估计中得到一个残差项,将其带入第二步中进行进一步运算,构造出方差协方差矩阵进行重新估计,但是如此运算往往会使得得到的方差存在向下的偏差,在按照 Windmeijer(2005)的方法进行调整后这种偏差会有所减小,但与此同时会导致近似渐近分布不可靠的问题。因此一步 GMM 估计在大多数经济问题分析中应用相对更为广泛。在一步估计和一阶差分选择的问题上,本文的考虑是一阶差分估计利用变量的信息往往要少于一步 GMM 估计,并且在一步估计中有关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也会得到有效控制。因此本文将选择 GMM 估计。

系统广义矩估计的回归结果报告在表6中。不难看出,无论是上市公司总体就业水平还是平均工资,其自身的滞后一阶对当前值都产生显著的正面作用,对于一个存续的上市企业来说,其雇佣员工人数和平均薪资水平在没有发生重大变故的情况下会在上一期的基础上根据经营状况进行变动。同时从平均工资的回归结果来看,无论是中国进口的总量还是强度也都产生了显著为正的影响。因此,本文的基本回归结果得到进一步验证。

3. 工具变量法

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的实质是采用变量本身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进行的回归,这种“被动”缓解内生性的方法仍然会存在回归结果有效性的质疑。为进一步缓解内生性,本部分试图通过引入核心解释变量的工具变量进行回归。在本文所研究的就业问题框架下,工具变量必须在满足一系列条件的前提下才能合理使用,需与核心解释变量高度相关且与就业无关。中国方面的进口关税作为重要的贸易壁垒,会较大程度的影响国际外贸企业的出口成本,自入世以来,中国按照承诺逐年调低了进口关税,关税的下降缩小了国外商品进入国内市场的成本,促进其出口(刘京军,2020),此外汇率也是影响出口的重要

表5 控制高阶固定效应

变量	(1)	(2)	(3)	(4)
	就业水平		平均工资	
中国进口	0.002** (0.006)		0.027** (0.022)	
进口强度		0.016* (0.232)		0.574 (1.09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国家×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2.933*** (0.390)	-8.075* (4.515)	3.916*** (1.090)	4.589*** (0.961)
观测值	78940	78940	78940	78940
R ²	0.834	0.873	0.885	0.885

注:括号内为在企业层面聚类的标准误差;***、**和*分别代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

表6 系统广义矩估计

变量	(1)	(2)	(3)	(4)
	就业水平		平均工资	
L1.lemp	0.461*** (0.013)	0.418*** (0.016)		
L1.lwage			0.410*** (0.031)	0.421*** (0.022)
中国进口	0.008* (0.003)		0.080*** (0.019)	
进口强度		0.511*** (0.022)		1.400* (0.67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AR(1)(P值)	0.000	0.000	0.000	0.000
AR(2)(P值)	0.441	0.112	0.651	0.211
Sargan(P值)	1.000	0.601	0.231	0.545
常数项	4.182*** (0.942)	3.996*** (0.944)	6.984*** (2.635)	4.964* (2.606)
观测值	65066	65052	65066	65052
R ²	0.562	0.728	0.810	0.619

注:括号内为在企业层面聚类的标准误差;***、**和*分别代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四列回归中差分方程所用的工具变量有7个,水平方程所用工具变量有1个;表中所有回归的工具变量有效性检验 Sargan 统计量和扰动项不存在序列相关检验 Arellano-Bond 统计量表明在1%显著水平接受了原假设,即动态面板系统广义矩估计结果是有效和一致的。

因素。因此中国进口关税和汇率可以作为对中国出口的工具变量^④。表7的结果显示在应用了工具变量回归后中国进口对就业水平的影响依然显著为正,与前文结果一致。第一阶段的估计结果表明,无论是加权平均进口关税还是进口税率都与中国进口呈显著的负向关系,而且第一阶段估计的 F 值均大于10并在1%置信度下显著,这就初步证明工具变量的选取是合理的。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总量还是强度,中国进口对平均工资的影响要明显大很多,且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相比就业水平,制造业企业的员工平均工资受到的影响更大,这也可以作为解释就业促进效应的一个合理的传导机制。此外,四个回归的Kleibergen-Paap rk LM统计量 P 值均为0.000,且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均大于弱工具变量检验Stock-Yogo统计量在10%~25%的值,表明本文所选用进口关税和汇率的变量都通过了识别不足检验和弱工具变量检验,同时四个回归的Sargan统计量 P 值均大于0.100,说明所用工具变量均通过了过度识别检验。综合来看,本文所选用进口关税和汇率变量来作为中国进口的工具变量是合理和有效的。

4. 其他稳健性检验

核心解释变量指标替换。基准回归中分别采用了出口总量和出口强度指标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两者皆显著促进了全球上市公司的总体就业水平和平均工资,其中出口强度的影响系数相对更大。

因变量指标替换。王永钦和董雯(2020)用上市公司总体就业人员的对数值表示企业的用人需求,并结合平均工资多方面考察了机器人引入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沿袭这个思路,本文的回归结果证明,中国进口不仅拉升了全球制造业企业的就业需要,扩大了就业规模,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平均工资的增长,这再次证明了文本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实证方法方法替换。本文先后通过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和工具变量方法对基准回归结果进行了逐一验证,结果皆表明中国进口全球制造业就业的促进作用显著而稳健的。后续本文会从贸易自由化的视角,应用双重差分法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

5. 对照检验

本章节所用样本的时间区间是从1996—2019年,在此期间,得益于全球化的推进与深化,全球经济都经历了一个快速稳定发展的过程。因此本文的回归检验便衍生出一个潜在问题,在此区间内全球各国失业率的下降是不是仅仅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普遍效应?抑或说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只是扮演了受益者的角色,而不是全球红利的供给者?为对这种质疑进行验证,本部分通过选取代表性的国家作为参照,对比与中国进口影响的大小。参考刘京军(2020),为使得参照国的选取具有实际意义,本文使用美国和印度的贸易数据进行实证分析^⑤。

表8汇报的对照检验回归中除了控制了常规的控制变量外,还控制了国家固定效应和行业×年份固定效应来控制国家和随着行业和年份变化的未观测到的因素。从对就业水平的影响结果可以看出,只有中国进口对全球制造业就业水平的影响显著为正,而美国虽然为世界第一大进口国,但其对就业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相似的印度进口也未对就业水平产生显著的影响。从对工资水平的影响结果来看,三国进口对工资水平的影响均显著为正,这说明美国进口和印度进口与中国进口对全球制造业企业的工资水平的影响一致,都存在正向促进效应。

表7 工具变量回归

变量		(1)	(2)	(3)	(4)
		就业水平		平均工资	
第一阶段 回归结果	进口关税	-0.042*** (0.001)	-0.030** (0.009)	-0.042*** (0.001)	-0.030** (0.009)
	进口汇率	-0.011*** (0.002)	-0.011*** (0.001)	-0.011*** (0.002)	-0.011*** (0.001)
	第一阶段 F 值 (P 值)	134.621*** (0.000)	215.43*** (0.000)	134.621*** (0.000)	215.43*** (0.000)
第二阶段 回归结果	中国进口	0.081* (0.044)		2.003*** (0.221)	
	进口强度		1.219* (0.963)		2.941*** (0.14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477 (0.948)	0.879** (0.435)	6.969*** (4.783)	1.889*** (2.230)
观测值		78940	78940	78940	78940
R^2		0.154	0.112	0.039	0.355

注:括号内为在企业层面聚类的标准误差;***、**和*分别代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

④ 参考Li和Zhan(2019),在获取各国对美元名义汇率和各国CPI数据后,计算各国对人民币的双边实际汇率,然后以各国SIC4位码行业层面的进口占比作为权重计算得到行业层面的进口税率;由于本文样本区间是从1996年开始,所以中国方面的进口关税原始数据统一为1996标准的HS编码(HS1),在通过与世行的HS1-SIC对照表合并后得到SIC4位码行业层面的关税。

⑤ 美国在样本期内一直是全球第一大进口国,而印度的经济发展阶段与中国相似,因此这两者与中国进口更加具有可比性(刘京军,2020)。

以上比较研究发现,综合对比就业水平和工资水平的效应来看,中国进口对全球制造业就业的影响与美国和印度相比存在明显差异,这赋予了中国进口不同于其他国家进口的特殊意义。基于世界和中国贸易发展的历史进程和特点,本文总结出三个方面来解释中国进口的这种特殊性:第一,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外贸得以迅速增长,得益于中国进口规模的增长和进口结构的改善,贸易伙伴国在此过程中充分发挥本身比较优势实现了总量增长。第二,按照洪俊杰和商辉(2019)，“共轭环流”是中国自加入 WTO(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以来对外开放的一个显著特点,这决定了中国进口在全球价值链中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殊位置。从 GVC(Global Value Chain)的分工网络体系中可以看出,价值环流是以两种形式存在的,一种是以发达经济体为核心的环流,另一种是以发展中国家为核心的环流,而中国则处于这两种价值环流交叉的枢纽位置,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很大一部分是依赖于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角色和分工。第三,中国进口结构具有“中国特色”。与以资本品和高等技术产品为主要进口品的结构不同,中间品和中等技术、初级产品是中国进口结构中主要的构成部分,这种“中国特色”的进口结构会通过产业链的上下延伸不断刺激相关行业产业的生产发展,不仅如此,这也会带动国际社会对中国市场的良好预期,而这些恰好是财富创造的重要动力源,贸易对象国的外贸企业会通过与中国市场的贸易往来加大生产投入,扩大规模,从而扩大员工规模和提升工资水平(刘京军等,2020)。

五、进一步分析:异质性与影响机制

(一)异质性分析

1. 基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

根据世行对收入程度的划分,将本文样本内各个国家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个样本,分别用工具变量法检验中国进口对两个样本就业水平和工资水平的影响,结果见表 9。从就业水平来看,中国进口显著促进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就业水平,但是对发达国家就业水平的影响要大于发展中国家,这从特征事实中也可以看出,中国从高收入国家的进口规模要明显大于其他国家。因此对其就业的正向作用也相应较大。从工资水平来看,中国进口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作用完全相反。中国进口对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的影响系数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但是对发展中国家工资水平的影响却显著为负,这说明中国进口对制造业企业工资水平的影响是根据国家收入水平而变化的,这可能是因为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比较接近,中国进口规模的扩大在一定程度对发展中国家的工资水平存在挤出效应。

2. 基于不同时间段

从特征事实分析中的贸易走势可以看出,在入世以前,中国进口处于低位波动状态,增长较为缓慢,1992—2001 年增幅仅为 1629.6 亿美元,自加入 WTO 以后至今,进口额实现快速上涨,直至 2017 年增幅高

表 8 对照检验

变量	(1)	(2)	(3)	(4)	(5)	(6)
	就业水平			平均工资		
中国进口	0.034*** (0.007)			0.039** (0.005)		
美国进口		-0.032 (0.040)			0.213* (0.102)	
印度进口			0.063 (0.044)			0.276** (0.12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国家固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2.370*** (0.211)	-12.092*** (0.268)	-12.319*** (0.222)	9.364*** (0.617)	8.301*** (0.713)	8.762*** (0.626)
观测值	78940	78940	78940	78940	78940	78940
R ²	0.592	0.592	0.592	0.746	0.746	0.746

注:括号内为在企业层面聚类的标准误差;***、**和*分别代表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

表 9 异质性分析:基于地区发展程度

变量		(1)	(2)	(3)	(4)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就业水平	平均工资	就业水平	平均工资
第一阶段 回归结果	进口关税	-0.031*** (0.001)	-0.030*** (0.001)	-0.042*** (0.014)	-0.036*** (0.009)
	进口汇率	-0.025*** (0.000)	-0.025*** (0.000)	-0.013*** (0.000)	-0.013*** (0.000)
	第一阶段 F (P)	245.612*** (0.000)	215.871*** (0.000)	145.341*** (0.000)	101.114*** (0.000)
第二阶段 回归结果	中国进口	0.105** (0.070)	1.797*** (0.316)	0.015* (0.060)	-0.398* (0.20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189 (1.310)	51.701*** (6.037)	7.460*** (1.345)	21.987*** (6.058)
	观测值	63168	63168	15772	15772
	R ²	0.131	0.028	0.137	0.023

注:括号内为在企业层面聚类的标准误差;***、**和*分别代表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表中 4 个回归的 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 P 值均为 0.000,且 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均大于弱工具变量检验 Stock-Yogo 统计量在 10%~25% 的值,表明本文所选用工具变量都通过了识别不足和弱工具变量检验,同时 4 个回归的 Sargan 统计量 P 值均大于 0.100,通过了工具变量过度识别检验,所有检验表明本文所用方法和选用的工具变量合理有效;如无特别说明,下面表格采用同样的工具变量检验方法。

达16002.4亿美元。所以将样本分为1996—2000年和2001—2017年两个子样本,用工具变量法分别进行回归检验,结果见表10。从就业水平来看,中国进口对入世以前的就业影响不显著,对入世后的就业水平影响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从工资水平来看,中国进口对入世前后的工资水平的影响都显著为正。总体来看,入世前的中国进口未形成规模。因此对全球制造业就业没有实质性的促进效应,入世后由于中国全方面扩大进口,导致进口规模迅速上涨,从而显著带动了全球范围内就业水平和工资水平的提升。

3. 基于贸易商品差异

从图2中可以看出,中国进口产品中中间品最多,资本品其次,消费品相对最少,从变化趋势上看,1992—2018年也是中间品进口增幅最多的一段区间。因此中国进口的产品结构对贸易对象国的就业产生的异质性影响需要进一步探究。本文根据联合国对照表将SIC代码最终对照到BEC代码,并一步将样本分类为资本品、中间品和消费品三个子样本进行回归检验。结果显示见表11,资本品进口对就业水平和工资的影响均不显著,对中间品和消费品的进口均显著促进了就业和工资水平,这可能是由于:第一,资本品的进口规模总量并不大,而且增长也较缓慢;第二,根据Dutt(2009),当各部门的搜索参数相同但要素密集度参数不同时,出口更能促进劳动密集型国家(行业)的工资率,降低其失业率。因此对本文的研究来说,相对于消费品,资本品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产品,其出口的扩大对就业的影响相对有限,而消费品的进口规模虽然也不大,但其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产品。因此中国扩大对其进口能够显著促进就业和工资水平。

表10 异质性分析:基于时间节点

变量		(1)	(2)	(3)	(4)
		入世以前		入世以后	
		就业水平	平均工资	就业水平	平均工资
第一阶段 回归结果	进口关税	-0.028*** (0.001)	-0.031*** (0.001)	-0.030*** (0.004)	-0.030*** (0.007)
	进口汇率	-0.013*** (0.000)	-0.020*** (0.000)	-0.018*** (0.000)	-0.012*** (0.000)
	第一阶段F(P)	125.321*** (0.000)	145.313*** (0.000)	243.511*** (0.000)	220.131*** (0.000)
第二阶段 回归结果	中国进口	0.312 (0.225)	3.505* (0.388)	0.071** (0.145)	1.991*** (0.21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5.240*** (4.927)	74.256** (37.692)	1.559* (0.936)	50.329*** (4.582)
观测值		3944	3944	74996	74996
R ²		0.050	0.244	0.175	0.064

注:括号内为在企业层面聚类的标准误差;***、**和*分别代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表中(1)~(4)列工具变量都通过了识别不足、弱工具变量检验和过度识别检验。

表11 异质性分析:产品差异

变量		(1)	(2)	(3)	(4)	(5)	(6)
		资本品		中间品		消费品	
		就业水平	平均工资	就业水平	平均工资	就业水平	平均工资
第一阶段 回归结果	进口关税	-0.020*** (0.001)	-0.020*** (0.001)	-0.025*** (0.001)	-0.025*** (0.001)	-0.023*** (0.001)	-0.023*** (0.001)
	进口汇率	-0.010*** (0.000)	-0.010*** (0.000)	-0.018*** (0.000)	-0.018*** (0.000)	-0.010*** (0.000)	-0.010*** (0.000)
	第一阶段F(P)	111.301*** (0.000)	118.483*** (0.000)	251.300*** (0.000)	252.000*** (0.000)	110.211*** (0.000)	119.483*** (0.000)
第二阶段 回归结果	中国进口	0.241(0.270)	-1.759(11.706)	0.100**(0.047)	1.638*** (0.209)	0.772*** (0.242)	2.289*** (0.80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5.346(5.640)	346.368(247.115)	1.790*(1.008)	35.354*** (4.402)	18.930*** (5.511)	64.973*** (19.714)
观测值		26785	26785	43754	43754	8401	8401
R ²		0.036	12.034	0.143	0.051	0.085	0.027

注:括号内为在企业层面聚类的标准误差;***、**和*分别代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表中的(1)~(4)列工具变量都通过了识别不足、弱工具变量检验和过度识别检验。

(二)影响机制

主流文献对总体就业情况的分析相对集中,为能够进一步从不同视角来反映出影响就业的机制和渠道,一支文献基于就业创造和就业破坏的角度对影响就业的机制进行了系统分析,这方法是Davis和Haltiwanger(1992)在1992年首次提出,此后这一分析角度在诸多研究劳动力市场动态变化的文献中得到了广泛运用(Andersson et al, 2000; Haltiwanger, 2003; Klein et al, 2003; Boeri and Macis, 2010; Colantone, 2012)。国内学者马弘等(2013)通过就业创造和就业消失的分析框架对1998—2007年间中国制造业就业变动进行了详尽分析,发现在此期间这两种现象在中国制造业同时大规模发生,但是在不同的细分行业里有显著差异。毛其淋和许家云(2016)的研究与马弘等(2013)有些不同,前者研究的是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如何影响了中国制造业

就业变动,其核心问题是将就业创造与就业破坏作为影响机制来探究制造业就业变动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在提高了就业创造的同时降低了就业破坏,然后这两者共同作用于总体制造业就业净变化率,最终产生了就业增长效应。基于已有文献,本部分将从就业创造和就业破坏两个视角来回答如下问题:中国进口对全球制造业就业的带动是否同时存在就业创造和就业破坏?如果存在,是哪一种力量占据主导地位?两个机制的作用是否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而发生变化?

表 12 采用了工具变量法对两种机制进行回归分析。可以明显看出,就业创造两列中中国进口和进口强度的系数都显著为正,就业破坏两列中中国进口和进口强度的系数都显著为负,可以得出,中国进口带来的全球制造业就业促进效应是通过促进就业创造和降低就业破坏发挥作用的。可能的解释是,首先,自中国加入 WTO 以来,进口关税逐渐调低,加上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中国市场需求非常旺盛,进而中国进口的规模也越来越大,这将直接拉动企业生产扩张和投资的增长。因此用工需求相应增加。其次,得益于中国扩大对外开放战略的不断推进,海关方面

也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创新来减少外贸企业的通关成本,这给外贸企业创造了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而中国稳定持续发展的市场不仅会带动已有出口企业的扩张,同时也会诱使一些新企业进入,从而总体的用工需求会快速提升(Bas, 2012; 毛其淋和许家云, 2016)。在就业破坏的抑制效应上,两者影响系数的显著性为 1%,高度显著为负,这是因为企业规模的扩张和销售额的增长从另一个角度降低了裁员的需求。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利用标准普尔公司数据库的全球上市公司财务数据与 world integrated trade solution(WITS)的贸易数据和关税数据,研究了中国进口与全球制造业就业的关系,经过一系列实证分析,发现通过对中国出口,相关国家的制造业就业实现正增长,而且对中国出口与对其他国家出口带来的增长效应有所差异。此外,两者关系会在不同贸易商品、经济发展程度和时间样本之间存在异质性。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从就业创造和就业破坏两个方面展开了机制分析,结果显示中国进口是通过抑制破坏和促进创造总体上激发了就业的增长。

不同于以往中国进口对国内经济影响的研究,本文聚焦于中国进口对全球制造业就业的影响,从劳动力就业的角度对中国需求冲击的全球效应进行了深入挖掘,事实和研究结果表明了中国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通过自身的发展为全球福利的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本文的研究并不是鼓励无限制地“利他”性的进口,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继续与世界各国分享中国发展红利的时候,我们更加需要警惕扩大进口对本土经济产生的短期和长期影响(王权和郝宇彪, 2022)。因此,本文建议在不断扩大进口的同时加强国内市场经济的建设,建立更加高效的市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作用,鼓励本土企业的技术创新,保持自身产品竞争力,在进口竞争的背景下获得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 [1] 董艳梅, 朱英明, 2016. 高铁建设能否重塑中国的经济空间布局——基于就业、工资和经济增长的区域异质性视角[J]. 中国工业经济, (10): 92-108.
- [2] 冯宗宪, 李诚, 2022. RCEP 框架下中国商品进口增长特质及动力解构[J]. 经济体制改革, (5): 114-120.
- [3] 洪俊杰, 商辉, 2019. 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共循环流论”: 理论与证据[J]. 中国社会科学, (1): 42-64, 205.
- [4] 刘京军, 鲁晓东, 张健, 2020. 中国进口与全球经济增长: 公司投资的国际证据[J]. 经济研究, 55(8): 73-88.

表 12 影响机制: 就业创造还是就业破坏

变量		(1)	(2)	(3)	(4)
		就业创造		就业破坏	
第一阶段 回归结果	进口关税	-0.031*** (0.001)	-0.030*** (0.001)	-0.031*** (0.001)	-0.030*** (0.001)
	进口汇率	-0.015*** (0.000)	-0.022*** (0.000)	-0.015*** (0.000)	-0.022*** (0.000)
	第一阶段 F (P)	122.331*** (0.000)	140.513*** (0.000)	122.331*** (0.000)	140.513*** (0.000)
第二阶段 回归结果	中国进口	0.110** (0.052)		-0.102*** (0.028)	
	进口强度		1.134** (0.424)		-1.566*** (0.37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152 (1.043)	2.045*** (0.468)	-1.345* (0.731)	-1.600*** (0.364)
观测值		78940	78940	78940	78940
R ²		0.210	0.341	0.204	0.208

注: 括号内为在企业层面聚类的标准误差; **、*和*分别代表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 表中四个回归的 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 P 值均为 0.000, 且 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均大于弱工具变量检验 Stock-Yogo 统计量在 10%~25% 的值, 表明本文所选用进口关税和汇率的变量都通过了识别不足检验和弱工具变量检验, 同时 4 个回归的 Hansen J 统计量 P 值均大于 0.100, 两个变量均通过了过度识别检验, 所以综合来看, 本文所选用进口关税和汇率变量来作为中国进口的工具变量是合理和有效的。

- [5] 李春顶, 郎永峰, 何传添, 2021. 中国扩大进口战略的经济效应[J]. 中国工业经济, (2): 23-41.
- [6] 马弘, 乔雪, 徐娜, 2013. 中国制造业的就业创造与就业消失[J]. 经济研究, 48(12): 68-80.
- [7] 马双, 张劼, 朱喜, 2012. 最低工资对中国就业和工资水平的影响[J]. 经济研究, 47(5): 132-146.
- [8] 毛其淋, 许家云, 2016.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制造业就业变动——来自中国加入WTO的微观证据[J]. 经济研究, 51(1): 69-83.
- [9] 王权, 郝宇彪, 2022. 中国进口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 工业技术经济, 41(10): 85-91.
- [10] 王永钦, 董雯, 2020. 机器人的兴起如何影响中国劳动力市场? ——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J]. 经济研究, 55(10): 159-175.
- [11] 许明, 卿陶, 2022. 新发展格局下扩大进口与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布局[J]. 东南学术, (4): 157-166.
- [12] 张鹏, 张平, 袁富华, 2019. 中国就业系统的演进、摩擦与转型——劳动力市场微观实证与体制分析[J]. 经济研究, 54(12): 4-20.
- [13] 赵新泉, 卫平东, 刘文革, 2020. 新时期主动扩大进口的理论机制及政策建议[J]. 国际贸易, (7): 47-54.
- [14] “中国2020”课题组, 周其仁、秦晓, 2020: 中国在世界定位[J]. 国际经济评论, (3): 9-43, 4.
- [15] ACEMOGLU D, AUTOR D, DORN D, et al, 2016. Import competition and the great U.S. employment sag of the 2000s[J].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34(S1): 141-198.
- [16] AMITI M, M DAI, R C FENSTRA, ROMALIS J, 2017. How did China's WTO entry benefit us consumers?[R].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 [17] ANDERSSON L, GUSTAFSSON O, LUNDBERG L, 2000. Structural change, competition, and job turnover in swedish manufacturing, 1964-1996[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8(3): 566-582.
- [18] ASQUITH B, GOSWAMI S, NEUMARK D, et al, 2019. U.S. job flows and the China shock[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18: 123-137.
- [19] AUTOR D, DORN D, HANSON G H, 2017. When work disappears: Manufacturing decline and the falling marriage-market value of men[R].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NBER Working Paper No. 23173.
- [20] AUTOR D, DORN D, HANSON G, 2013. The China syndrome: Local labor market effects of import compet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6): 2121-2168.
- [21] BAS M, 2012. Input-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firm export decisions: Evidence from argentina[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97(2): 481-493.
- [22] BOERI T, MACIS M, 2010. Do unemployment benefits promote or hinder job reallocation?[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93(1): 109-125.
- [23] CALIENDO L, DVORKIN M, PARRO F, 2019. Trade and labor market dynamics: General equilibrium analysis of the China trade shock[J]. *Econometrica*, 87: 741-835.
- [24] COLANTONE I, 2012. Trade openness, real exchange rates and job reallocation: Evidence from belgium[J].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 148(4): 669-706.
- [25] DAVIS S J, HALTIWANGER J C, 1992. Gross job creation, gross job destruction, and employment reallocation[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7(3): 819-863.
- [26] DAVIS S J, HALTIWANGER J C, SCHUH S, 1996. Job creation and destruction[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 [27] DIMARANAN B, IANCHOVICHINA E, MARTIN W, 2007. Competing with giants: Who wins, who loses?[J]. *Journal of Economics*, 141(1): 1241-1321.
- [28] DONOSO V, MARTÍN V, MINONDO A, 2015. Do differences in the exposure to chinese imports lead to differences in local labour market outcomes? An analysis for spanish provinces[J]. *Regional Studies*, 49(10): 134-189.
- [29] DUTT P, MITRA D, RANJAN P, 2009.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unemployment: Theory and cross national evidenc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78(1): 32-44.
- [30] GROIZARD J L, RANJAN P, RODRIGUEZ-LOPEZ A, 2015. Trade costs and job flows: Evidence from establishment-level data[J]. *Economic Inquiry*, 53(1): 173-204.
- [31] GULEN H, ION M, 2016. Policy uncertainty and corporate investment[J].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9(3): 523-564.
- [32] HALTIWANGER J, LEHMANN H, TERRELL K, 2003. Job creation and job destruction in transition countries[J].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11(2): 205-219.
- [33] JULIO B, YOOK Y, 2012. Political uncertainty and corporate investment cycles[J]. *Journal of Finance*, 67(1): 45-84.
- [34] KLEIN M W, SCOTT S, TRIEST R K, 2003. Job creation, job destruction, and the real exchange rat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59(2): 239-265.
- [35] LALL S, 2000. The technological 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 of developing country manufactured exports, 1995-1998[J]. *Oxford Development Studies*, 28(3): 407-432.
- [36] MCMANUS T C, SCHAUR G, 2016. The effects of import competition on worker health[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 Economics, 102(10), 67-92.
- [37] MENDEZ O, 2015. The effect of chinese import competition on mexican local labor markets[J]. The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2015, 34(5), 21-41.
- [38] PIERCE J R, SCHOT P K, 2016.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mortality: Evidence from us counties[R]. Washington, DC: NBER Working Paper No. 22849.
- [39] PIERCE J, PSCHOTT, 2016. The surprisingly swift decline of U.S.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6(7), 1632-1662.
- [40] QIAN X, RAFIQUE K, WU Y, 2020. Flying with the dragon: Estimating developing countries' gains from China's imports [J]. China&World Economy, 28(5): 1-25.
- [41] ROBERT C F, MA H, XU Y, 2019. US exports and employment[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20(4): 46-58.
- [42] UTAR H, 2014. When the floodgates open: "Northern" firms response to removal of trade quotas on chinese goods [J].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6(4): 32-51.
- [43] WINDMEIJER F, 2005. A finite sample correction for the variance of linear efficient two-step gmm estimators[J].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126(42): 25-51.

The Impact of China's Imports on the World Econom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xpanding Imports: Perspective of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Zhang Wencheng¹, Li Guangwu², Chen Mingming³

(1. China Orient Asset Management Co., Ltd., Beijing 100033,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3. Business School of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61, Shandong,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growth of China's economy, China has become the world's largest exporter and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importer. Previous studies on China's trade mostly started from the supply side. However, from the demand side, what is the impact of China's imports on the world economy? Empirical analysis has been used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s imports and the world econom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mport expansion strategy. The results show as follows. Through exports to China,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in relevant countries can achieve positive growth, b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will vary among different samples of traded commodities, economic development degree and time. On this basis, China has reduced the global unemployment rate to some extent through the role of "world market", but the government also need to be vigilant about the impact of "import competition" on our economy.

Keywords: expand import; world market;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job creation